

中国·民族文化宫藏品系列

# 中国少数民族面具

朝华出版社

---

# 中 国

---

# 少 数 民 族

---

# 面 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面具 / 郑俊秀主编  
北京 : 朝华出版社, 1999.9

ISBN 7-5054-0583-7

I. 中…  
II. 郑…  
III. 面具 - 中国 - 图集  
IV. J52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1999) 第46454号

中国·民族文化宫藏品系列  
**中国少数民族面具**

民族文化宫编

朝华出版社出版

中国北京车公庄西路35号 邮政编码100044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发行

中国北京车公庄西路35号

北京邮政信箱399号 邮政编码100044

1999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54-0583-7/J.0350

定价：260.00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制

## 内容提要

面具文化是一种世界文化，广布于世界各大洲。在中国，面具文化不仅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而且随着地域和各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不同，更是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寄寓着各自民族的信仰、习俗、愿望和审美观念。

《中国少数民族面具》是近十年来民族文化工作者经过实地调查、考察和深入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作。全书按面具的社会功能分为跳神面具、生命礼仪面具、镇宅面具、节日祭祀面具、戏剧面具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又按面具的不同文化类型，配以图片进行叙述和介绍，从而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中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面具文化，揭示出面具的多种功能。置于书前的《概论》则详细介绍了面具的起源及其文化特征、面具的形制及其造型的发展变化。而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长曲六乙为本书写的序言，又给了读者一把认识和了解中国少数民族面具文化的“钥匙”，以开启新兴的人文交叉学科——中国面具学。

---

# 中 国

---

# 少 数 民 族

---

# 面 具

---

朝 华 出 版 社

中国·民族文化宫藏品系列  
图集编辑委员会

主任：春世增

副主任：胡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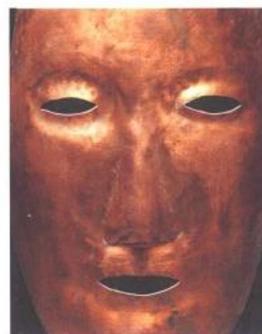
策划：史海波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旭铭 们发延 史海波 李铁柱 灿曲

肖志强 陈政政 何晏文 郑俊秀 春世增

钟兴奎 胡建生 段梅 秦晋庭



中国·民族文化宫藏品系列  
《中国少数民族面具》

主编：郑俊秀

副主编：段梅 钟兴奎

策划：史海波

编审：萧师铃

责任编辑：杜鹃

编辑：姜成安

撰稿：郑俊秀 段梅 徐彬 草诗翠 雍继荣

摄影：严钟义 张丹波

场景摄影：陈跃 李铁柱 赵晨 高进丽 卜永光 王梦祥 孙军

艾里肯 巫允明 沙育昭 杨咪双 张鹰 雍继荣

资料：马凤琴 马旭铭 付建立 杨仁兴 郝承芝 周南生

盖亚平 白玉英 灿曲 陈宏 陈跃 郭存谦

绘图：郑虹 计红梅

装帧设计：郑虹

中国  
少数民族  
面 具

B  
S  
Z

# 目录

序	6-7
概论	8-27
跳神面具	28-99
萨满面具及其它神具	30
跳曹盖面具	34
羌姆面具	36
师公面具	56
傩堂面具	84
生命礼仪面具	100-117
度戒面具	102
婚礼面具	104
丧礼面具	106
镇宅面具	118-131
镇宅面具及其器物	120
春灯	128
节日祭祀面具	132-159
草人假形	134
新年祭祀面具	136
秋报祭祀面具	140
上座部佛教节日面具	148
节日娱乐面具	152
戏剧面具	160-213
撮泰吉面具	162
师公戏面具	166
傩堂戏面具	172
阳戏面具	180
地戏面具	188
藏戏面具	198
中国少数民族面具分类简表	214
近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面具分布简图	216
后记	218

# 序

## 一种特殊的生命寄存方式

中国傩戏学会会长 曲六乙

捧起这本画册，使我想起1995年中国傩戏学会和北京民族文化宫联手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少数民族面具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我国破天荒第一次举办的这次会上，学者们对十多年来发掘与研究中国面具的学术活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从面具的起源与功能、面具与宗教、巫术、民俗、舞蹈和戏剧的关系，面具的历史文化积淀和面具发展史，以及中外面具文化交流史，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这次学术会议标志着中国面具学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研讨中，学者们不能不面对一个令人十分难堪的事实，即我们的研究曾经远远落后于欧美和日本。以日本来说，从本世纪初叶开始，就陆续出版了很多有关日本面具的著作和画册，并主动向外国进行了广泛的介绍。他们还把这项工作同对外宣传与弘扬大和民族传统优秀文化遗产联系起来，以致在不少国家的博物馆里，都能看到日本的面具。1991年我去印度访问期间，便在喀拉拉邦首府的博物馆里，看到了精美的日本面具。它们与印度、缅甸、印尼等国的面具，摆满了几个展览台。很遗憾，却没有中国面具。

日本有珍藏面具的传统。我国隋唐时期曾流行《兰陵王入阵曲》、《秦王破阵乐》等面具舞。兰陵王、秦王的面具，在中国土地上早已荡然无存。但在日本至今还收藏着兰陵王、秦王等源自中国的面具，至今演出“雅乐”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戴着面具的《兰陵王》，以致我们出版中国戏剧史、中国舞蹈史时，不得不附上已经日本化了的兰陵王面具照片或绘图。

韩国在重视扶植本国传统的假面(面具)舞蹈、假面戏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面具的珍藏与研究。中国从商周到隋唐的宫廷大傩里，打鬼英雄方相氏，戴着“黄金四目”的熊图腾面具，叱咤风云1000多年。他的几经变迁的面具，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之中。但在韩国汉城的昌德宫里，至今珍藏着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木制大型四目方相氏面具(又称方相车面具)。它已经成为国家级的文物了。

这里还要提到远隔重洋的美国，在几个大学的图书馆里，珍藏着商周时期的青铜面具。它们是研究青铜文化、早期面具文化史的珍贵资料。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中国学者借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在研究傩戏、傩文化的同时，对考察、研究面具文化，投入了很高的热情。迄今为止，在短短的20年里，出版了《中国面具文化》(郭净)、《中国面具史》(顾朴光)、《中国古代面具研究》(李锦山、李光雨)，填补了这个学科的空白。还出版了十多种文图并茂的大型面具画册，其中《中国巫傩面具艺术》(薛若邻主编、陈宏仁、余大喜副主编)、《中国傩戏傩文化》(庹修明、姜尚礼编)、《贵州傩文化艺术》(吕光群编著)、《中国面具艺术》(赵作慈、陈阵主编)等都达到或接近了国际水平。

《中国少数民族面具》的出版，既继承了前述多种画册编选的经验，在内容方面又展示了新的不可替代的特色。

流行于中原地区的汉族面具，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面具是相当丰富的，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意蕴。从质材来说，主要是金、银、青铜、铜、鎏金等金属面具和木质面具、纸胎面具。但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面具，质材运用的范围相当广泛，除了金属、木、纸以外，还有毛皮、绒毡、布帛、棕皮、竹篾、柳编和茅草等等，经过巧妙的制作，都可以赋予新的生命，寄寓着某种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

中原地区的汉族面具，随着社会的整体发展，它的世俗化倾向越来越突出，历史人物神、民间传说神、地方保护神以及世俗人物等，可以说应有尽有。这是社会历史进步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则不然。50年代以前，不少地区或处于奴隶制、封建农奴制，或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残余，除了盛行自然崇拜、神鬼崇拜、巫觋崇拜外，在许多宗教祭祀信仰和民俗活动中，保留着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内容，因此反映在面具的角色上，始祖神、动物图腾神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如贵州威宁彝族的“撮泰吉”、湖南湘西土家族的“毛谷斯”、广西融水苗族的“芦管”，桂、湘两省区的瑶族的“盘王节”，内蒙古赤峰敖汉旗蒙古族的“好德格沁”等都是描写这些民族或部族的始祖，回到部落或村寨，向子孙后代教授本族的迁徙史和生产史，扫除瘟疫邪祟，祝福五谷丰登和四季平安。

另一类如云南楚雄彝族的“跳虎节”，青海上族的“跳菸兔”，广西壮族的“蚂蝗节”，四川、甘肃交界白马藏人(氐羌后裔)的“跳曹盖”(又叫“咒鸟”)等，则是以图腾崇拜为主，或把动物图腾与自己始祖联系起来，或与自然神(如山神、雷神等)相结合，描写他们为村寨驱鬼逐疫，或恩泽吉祥。

除了上述这两类属“族傩”或“社傩”的范畴外，还有一种“寺傩”，这就是藏族的“羌姆”，蒙古族的“差玛”和北京雍和宫的“跳布札”(俗称“打鬼”)。它的目的除了喇嘛僧侣心灵的自我净化外，仍然是清除鬼蜮，召喚吉祥与安宁。扮演的角色多为藏传佛教神和牛、鹿或蝴蝶等动物神。

在上述这些民俗祭祀、宗教仪式等傩事活动中，面具占有突出地位，它不仅是造型艺术的主要手段，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寄存方式，具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这些少数民族的面具与汉族面具一样，孕含着人类生命意识、生存意识和巫术意识。但比起后者不仅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多元化的特征，并具有不可比拟的原生态和再生态，因而在艺术上更具有原始美。为研究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少数民族美术史和戏剧发生学等学科，提供了丰富、珍贵而又鲜活的资料。

世界上许多古老部族、民族都有自己的面具史，这些经历了数千年历史的面具，反映了本族宗教心态、民俗心态和审美心态的发展与变迁。面具史几乎与文明史同步。作为一种新兴的人文交叉学科——中国面具学尚处于初建阶段。少数民族的面具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搜集与研究。目前，我国仅在贵州的安顺和铜仁建立了小型的面具展览馆。北京民族文化宫有着令人钦羡的超前意识，它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收集了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面具，在1995年面具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对外公开展览，给与会学者和观众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我热诚地期望这些相当珍贵的面具，不但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明史、美术史、工艺史等学科的研究资料，还要积极推向国外、组织展览，进行中外面具文化的交流，宣传我国多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而这本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则是这批面具精萃的汇编，具有珍贵的收藏价值、观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一九九九年九月于北京

# 概论

中国是世界上面具有历史最悠久、流传最广泛、内容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及至今天，面具仍以鲜活的形象流布于中国的24个省、自治区的39个民族中，构成世界面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除汉族外，有38个民族的面具覆盖了17个省、自治区。少数民族的面具更以其形制的多样、造型的丰富、内涵之深邃，在中国乃至世界面具宝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它的存在和辉煌鲜为人知。

面具是泛人类文化现象，滥觞于史前。旧石器时代的面具至今未有实物可证，但根据欧洲发现的岩画内容，可以作出曾经使用过面具的推测。然而，新石器时代的面具却有实物可证。

中国史前时代的面具目前尚无实物出土。但在岩画、陶石绘雕制品中却留下了面具文化的踪迹。其中尤以岩画上夸张、变形的人兽面像，为我们传递了先民创造的最早的造型艺术——假形、假头的形象及其运用等诸多信息，展现了我们所未知的远古人们的精神世界。它告诉我们，少数民族的先民在岩石上所刻绘的超自然威力的精灵和与之交往的工具——面具，在人类的童年是被广泛地信仰并虔诚地运用着的。

已发现的遍布中国南北18个省、自治区的岩画上出现的大量造型怪诞的人兽面像、骷髅像和假形等，虽不能断定都是对面具的摹画，但其中必有不少画面是对头戴面具或身披鸟兽假形在实施巫术、进行祭祀、举行战争或狩猎前后的演练与仪式等行为的刻画。

目前中国已发现的岩画主要集中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古代少数民族先民曾聚居的地方。有些岩画成画年代虽已跨入文明的门槛，但仍可作为一种参照系；同时借助民族学资料以今溯古，逆向思考，对史前的面具作出推测和解释。正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指出的：“人类是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原理、同一的物质形式，所以在相同的文化状况中的人类经验的成果，在一切时代与地域中都是基本相同的。”

岁月悠悠，少数民族的先民，在峻岭悬崖、荒野蔓草间留下了他们假面崇拜的印迹。内蒙古阴山、白哈河、乌兰察布、乌海海勃湾、宁夏贺兰县贺兰口、新疆呼图壁、阿勒泰等地的岩刻画；四川珙县、云南沧源、元江它克、麻栗坡大王崖，贵州关岭和广西左江等地的崖壁画，都分别有人兽面像和假形装扮的形象出现。

树有根，水有源。少数民族地区的岩画为今天仍以活的形态活跃在少数民族的山寨牧野、村

社家院的祭坛神殿、社火戏台的面具艺术找到了它的源头。会说话的岩石向我们讲述了昨天和今天的历史联系，展现了少数民族源远流长的面具文化之源。

内蒙古阴山山脉西段上方幅岩画，最早距今有上万年的历史。大部分作品创作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人兽面像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题材。据专家研究，画上的人兽面像，除为自然物人格化、神化的形象外，还有对面具的刻画。如岩画上出现的人兽面像（图1）和假形化装（图2）当为面具的写照。“阴山各地的岩画中，尤其在壁立千仞、岩高涧深的地方，往往磨刻着许多人（兽）面像组成的神像壁。……其形貌千奇百怪，狰狞可怖，而富于变化。古人大约认为，

这些‘凡人’难以接近之地，恰是众神灵居住或登（升）天的地方。”（盖山林《阴山岩画》）在远古人类的眼中，面具正是寄居灵魂的载体，充满了灵性。古代的游牧民族如北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党项和蒙古族的先民等，都先后在这里活动过，岩画当为他们的遗迹。岩画或用于图腾崇拜仪式，或用于

与巫术有关的行猎行为，其作者就是舞蹈者、祈祷者的巫师。与阴山岩画相邻的乌海市海勃湾桌子山岩刻，人面像、动物面像非常集中，面像奇诡怪诞，变化无穷（图3）。人面像中有些面部

非常抽象化、图案化，“它们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一种模拟不同人脸的面具，或黥面的反映。……这里的原始居民也存在过头戴面具的事实。”（盖山林、王揭书）桌子山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内容百分之九十是人面像。年代早于桌子山岩刻的贺兰口人面像也几乎占该岩刻的三分之二。

云南麻栗坡大王崖壁画主体是两个形体巨大的人物，头部与身体比例不协调，约占全身的五分之二。头部硕大夸张，显系戴面具的形象（图4）。

岩画中大量的人兽面像的存在，反映了人类童年时期的少数民族先民对假面崇拜的痴迷和运用的执著。

云南沧源崖壁画最多的也是人物图像，崖壁画的年代约距今3000年左右（陈兆复《中国岩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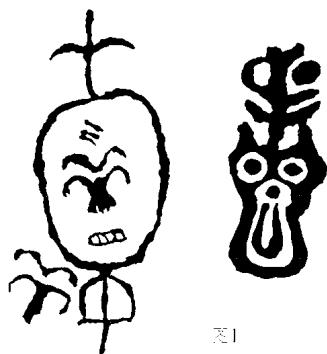


图1



图2



图3

图1 田有裕海上的面具面像  
图2 阴山岩画上的假形化装

图3 乌蒙山内海桌子山岩画上的面具像

发展史》)。该崖壁画内容丰富，其中一处展现了一个复杂的大型祭祀场面(图5)。画面上的人物化装有头戴羽冠，身饰鸟羽，作振翅腾飞状的“鸟形人”；有身部绘成长方形，头有许多竖线，双臂作平伸状者。另外还绘有牛和人拉牛的内容，可能为剽牛祭祀之用。(汪宁生《云南沧源崖画的发展与研究》)

画面上的两种化装，在今天的少数民族中仍能见到：前者见于景颇族“目脑(纵戈)”大型祭典中领舞人“脑双”的头饰和高山族、苗族、瑶族等的祭祖庆典中的男性舞者羽翎头饰；后者的化装可能是全身和头部用茅草扎束成假形，一如今天的湖南土家族纪念祖先所跳的毛古斯舞、云南砚山壮族开年节跳的草人舞、双柏彝族火把节前夕迎请众神所跳锣笙舞和广西融水“芒蒿”等的装扮，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所出现的人物一律双臂高举作祈祷状。其中有的图像与今天的民族学资料相对照颇多相似之处，恐非历史的巧合，发人深思。

广西扶绥县岜来山的崖壁画上把鸟类形象画在正身的首领人像的头顶上，宁明县花山崖画上则把动物(有人则明确指认为犬)画在正身首领人像的头顶上(图6)。有人认为这是壮族先民——越人的鸟崇拜和犬崇拜的反映。有的认为崖画上的人形为当时人们信奉的神、神话人物。我们认为，不管它代表了先民们的什么信仰，但它总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映照，所绘画面或许是举行祭祀时巫师(同时也是首领)的装扮：头上饰以禽鸟或动物(或为炮制物)，以期使禽鸟和动物身上的灵巧与力量传递到自己身上，从而获得超自然的力量，以驾驭现实，满足愿望。

我们看看现实对历史的观照：今天广西邕宁县一带壮族在中秋节前后的大排节由三名师公(巫师)戴鸟形头饰跳“莽罗婆”(意为有趣的斑鸠)；武宣县壮族春

节所跳的着篾编布制鸟形的翡翠鸟舞；凤山县俗称蓝靛瑶的村寨，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日在



图4

图4 云南麻栗坡大王崖崖壁画面具图像

图5 云南沧源崖壁画上的假形化装  
图6 广西宁明花山崖壁画上的人物与其头上的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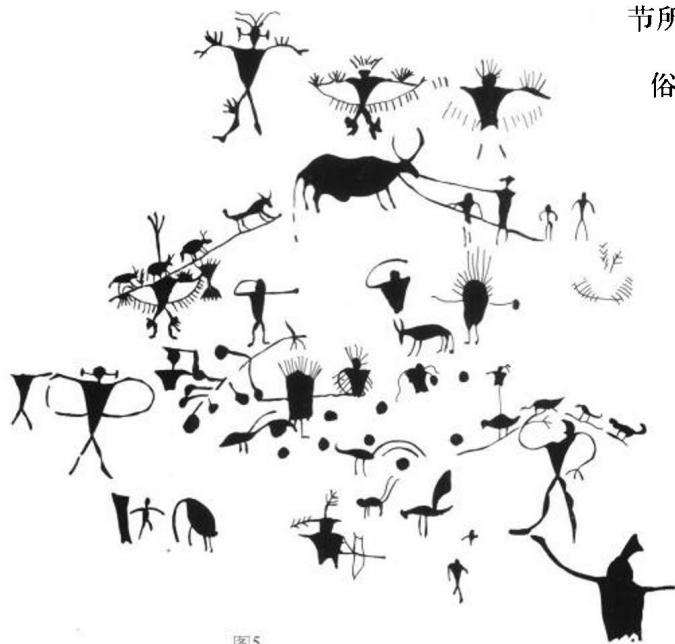


图5



图6

祠堂进行祭祀祖先、驱鬼酬神、祈求神灵赐福的活动。届时由一名斋公头顶缚一公鸡，手拿扁鼓边击边跳“条随”舞。三者同为以禽鸟形象出现的娱神除邪祈祥之俗的遗留。岁月也没有磨蚀掉以动物装扮除祟纳吉之俗：西藏珞巴族举行“索苗仁”祭虎灵仪式时，猎虎者身背虎头骨和竹编虎身前行；四川白马藏族“跳曹盖”时除戴木面具外，也顶戴“巴贡格宅”（野猪头）作面具，跳毕，将二面具悬挂于门上以辟邪；青海同仁县麻巴乡银扎木村藏族，每年农历六月“周格勒柔”盛会时，舞者中除手持木质“当果”（虎头）、“增果”（豹头）面具外，为首者还头戴以小牛犊头制成的“吾因果”（牛犊头）面具，活动结束后即将其悬挂在该村的庙内，以祈六畜兴旺。

上述南北的民族民俗活动折射出其先民在祭祀活动中对拟兽拟禽装扮的信仰及其迷恋，历数千年而不绝。

岩画和今天的少数民族面具民俗，为我们勾勒了人类初始经历了直接佩戴兽头禽冠及其皮毛羽翼，尔后逐渐为人工制作的假形、假头、假面取代的历史。

中国少数民族先民在进入文明时代后，其面具在发展着、变异着，以动物体态的假形、假头、假面充斥于场面中的情况有了改观，其功能、材质也不断丰富。少数民族地区出土的面具及其它文物可资佐证。

1969年在广西西林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铜面具，共八件，分别挂于铜棺的四角和两侧。其中一件高21.7厘米，最宽处19.2厘米，厚0.3厘米（图7）。面具造型基本一致，眼珠外突，双唇紧闭，系丧葬面具。有的学者认为墓主为句町（西林汉为句町地）统治者，铜面具为供墓主在冥间役使的殉人。1979年新疆新源县巩乃斯河畔出土了石人面具（图8），研究人员断为宋至元时期遗物。面具高23.5厘米，最宽处17.2厘米，最厚为6厘米；砂岩质，打磨光洁；圆目内凹，眼珠鼓突，瞳孔处有穿孔；鼻梁隆起，鼻翼肥大，鼻尖上翘；唇部薄而微张，留有口缝，具有典型“胡人”特征。面具边缘有一周凹槽，两耳和前额的凹槽上各钻有透孔，可能为镶嵌面具所用。面具功能不详，有的学者认为是巫术面具或为民俗面具，有的疑为丧葬面具。1986年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出土了辽代契丹人陈国公主及驸马的金面具。所覆金面具（图9）系用薄金片依照死者脸型模压锤揲成形，覆于死者面部。眼部作雕刻加工，眼、耳、口、鼻，不开缝孔。目前所知出土的辽代丧葬面具的质地有铜、银、金三种，其中以铜面具最多，金面具实属罕见。

内蒙古包头石湾汉墓出土了一件黄釉浮雕陶尊（图10）。它的出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国北



图7



图8



图9

图7 广西西林铜面具  
图8 新疆新源石面具  
图9 内蒙古奈曼金面具

方历史上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佩戴面具的状貌。画面上除有头戴牛、羊等五种假面、假形的舞者外，尚有三个耐人寻味的图像：其一，上栖二鸟的神树，似乎与信仰萨满教的早期渔猎民族

的神树崇拜有关。满族等旧时信仰萨满教的民族，由崇拜代表祖先的神树进而崇拜神木，而又神杆（满族称“祖宗杆子”），及其神杆上的木斗内置牺牲以饲鸟鹊的习俗，所反映的祭祖—祭天，以通天地的信仰；其二，画面上所绘爬虫，可能是萨满祭祀仪式中所见的迎请百虫之首——九尺蟒神，以祈吉顺安泰之俗，此俗在今天部分满族野祭中仍见遗绪；其三，为张弓欲射者，即萨满为死者亡灵射箭引路以期顺达冥界的信仰，此俗仍保持在近代赫哲族丧葬仪



图10

式“摆档子”中。届时萨满站在高台，面向西方连射三箭，为死者灵魂指路。故此陶尊实含扮成动物的巫师，为亡者驱鬼护灵使之返回氏族树的寓意。



图11

图10 内蒙古包头石湾陶尊浮雕  
图像(局部)

图11 吉林集安兽面纹瓦当

吉林集安县出土了高句丽时期的面具型兽面纹瓦当。其上兽面怒目圆睁，鼻孔大张，目上有火焰状眉，方口上翘，门齿外露，獠牙雄劲，狰狞恐怖（图11）。黑龙江克东县金代古城址中也出土了面具型兽面纹瓦当，面像诡谲狞厉。两瓦当均为护宅祛祟的神兽，多见于高句丽时期和金代的建筑中。建筑构件面具化造型的广泛运用，透露了古代假面崇拜的盛行及延伸。

以上发现在中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和属于少数民族的岩画、面具及其面具造型文物等，向人们提供了历史的真实：面具是中国各民族共生的文化现象，历史悠久；中华民族史前文明的曙光，是由分布于神州内的东西南北中多个中心的地域文化之光，交相辉映，照亮了古老历史文化的源头，闪烁在中国大地上。作为中华民族本原文化中独特一支的少数民族面具的历史，犹如多条可以滥觞的潺潺细流，其初始就表现了多彩多姿，并蜿蜒汇入中华民族的面具文化长河，自古至今绵延不断。

## 二

面具是人类思维意识发展和宗教情感的产物，是在史前人类独特的心理和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孕育诞生的。面具作为审美感觉产生之前的原始造型最重要的形式，它的产生非单一因素的推动，而是原始狩猎、部落战争、巫术信仰、头颅崇拜、图腾崇拜及祭祀仪式等多种因素孕育产生的。其中巫术信仰和头颅崇拜是其产生的沃土和源头。

根据地上考古和民族学的资料可以判断，最早面具是动物的假头。面具最早可能源于狩猎巫术。在狩猎和举行仪式时，顶戴禽冠、兽头或直接抹涂脸部、躯体及用鸟羽、兽皮装饰全身的假形化装是面具的初始形态。史前人类最早无明确的超自然体观念。为了维持生命获得食物，渔猎时企图靠某些特定行为对特定目标施加影响，以保障获取成功。例如模拟渔猎对象的形态和活动，如披戴鸟兽头冠和皮毛并做与对象相似的动作，隐蔽自己、麻痹对方，以求尽量少惊动要接近的目标，提高命中率。此类行为常在事先的演练和成功后的重演中被一再重复。于是“行动的实效性和娱乐性，实感性和幻象性，都无意识地混合在一起”。（《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偶然的成功，误认为是在披戴兽头、兽皮的假形和动物的原型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交感关系，保证了狩猎的成功。“这些心理状态逐渐变成一种凝固化了的心理轨迹”。（朱狄《原始文化研究》）于是从这样的活动中，演化成为保证猎获成功而披戴兽冠、兽皮等仪式，演化出各种法术、巫术，逐渐成为人们普遍的信仰。由此被认为是带有某种巫术力量的面具——以鸟兽冠及羽毛兽皮装扮的假形和为了简化，以“点”代“面”的鸟兽冠的假头——这种使人“异己”成“非人”的物化形态就这样诞生了。

在人类早期文化中，巫术作为控制世界的一种工具被广泛地运用着。洪荒时代的先民，被充满严酷、危险、神秘莫测的环境所笼罩，他们把无法驾驭的神秘力量看作是有敌意的力量，而巫术正是驾驭这些有敌意的力量的唯一可靠途径，企图通过某种力量对客体施加影响与控制，保证达到它所希望的结果。在欧洲岩洞中发现的一些旧石器时代的雕塑和绘画，都显示了巫术的痕迹。法国莱斯·特洛亚·费莱尔岩洞画有一幅被认为是手持乐弓，戴着动物头盔，正在演奏的巫师，或是表演一种祭祀中的具有符咒性质的舞蹈，或是在洞穴中举行成人礼留下的痕迹。（朱狄，《上揭书》）

巫术活动的执行者是巫。巫的称谓在中国出现很早，本意为舞，甲骨文巫字像一人手执牛尾起舞。《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中记述了传说中的远古之乐舞，“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此实乃巫舞。“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说文解字》）巫的活动的重要内容便是舞，以舞降神、娱神、巫舞一体。这一特点在少数民族地区发现的岩画和出土的文物中均可见到，并一直延续遗留在今天的少数民族的节日祭祀、禳灾祈祥的宗教活动中，而具则是此场合巫师手中的重要法器。

在云南滇池地区出土的战国至东汉时期青铜器上有多种巫与巫舞的形象。晋宁石寨山出土的



图12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  
巫师形象